

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以孔子学院海外文艺巡演主持词的英译为例

付梦甜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4年6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4年8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4年8月26日

摘要

在全球化时代, 对外宣传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在跨文化交流中, 对外宣传对树立良好健康的形象、传播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 翻译是对源文本的一种改写, 而且这种改写是对源文本的操纵, 它不再局限于文字之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对话交流, 反映了译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文章基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 分析了操纵论在外宣翻译中应用的可行性。结合译例, 详细描述了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外宣翻译过程的操纵, 旨在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操纵下的改写对外宣翻译的影响, 引起人们对外宣翻译中改写的关注, 这对地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操纵理论, 外宣翻译, 意识形态, 诗学, 改写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ipul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Overseas Cultural Gala by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Moderator's Remarks

Mengtian F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Jun. 27th, 2024; accepted: Aug. 13th, 2024; published: Aug. 26th, 2024

Abstra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publicity has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In cross-cultural com-

文章引用: 付梦甜. 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8): 365-370.

DOI: 10.12677/ml.2024.128699

munication, foreign public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 positive image, spreading Chinese stories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In Lefevere's view, translation is the rewriting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text, and rewriting is a kind of manipulation, which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conversion between words, but a higher level of cultural dialogue and exchange, reflect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oetics of the era and society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lives. Based on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nipulation theory in publicity translation. Combined translation examples, this paper details the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and poetics o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aiming to draw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rewriting in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rewriting under ideological and poetic manipulation on the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Keywords

Manipulation Theory,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Ideology, Poetics, Rewrit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可能会对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产生重大影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应该更加注重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的实用翻译。因此,对外宣传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外宣传对树立良好健康的形象、传播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翻译质量则是对外宣传材料受欢迎的关键,因为好的翻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并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

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对源文本的一种改写,而且这种改写是对源文本的操纵,它不再局限于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对话交流,体现了对非语言因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等的操纵,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所盛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1]。本文在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基础上,通过对翻译实例的分析,较为详尽的描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外宣翻译过程的操纵,旨在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操纵下的改写对外宣翻译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对外宣翻译中改写的关注,这对地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宣译者要兼顾自身的需求、赞助人的要求和目标受众的期待等因素,外宣翻译才能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

2. 操纵论在外宣翻译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破了语言和文本的局限,将研究扩展到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许多翻译研究的文化流派突破了语言的限制,将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理论,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文学制度、政治权利等社会因素对翻译产生的影响。这些突破引发了翻译研究的一场重大革命——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是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审视翻译,研究文化与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身份构建以及翻译文本背后的利益[2]。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于90年代共同撰写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本质上的文化交流[3]。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操纵学派逐渐形成。在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诗歌和赞助人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发展和20

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思想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学者认为，操纵论将翻译从微观的语义世界扩展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宏观翻译现象和活动。

早在 1985 年，勒菲弗尔就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对翻译操纵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总结了三个主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并首次将“改写”这一的概念引入到翻译中。他主张：翻译就是对原文进行改写，这种改写是一种操纵。所谓改写，实际上是在目标语言或其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目标语言的诗学、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原文进行编辑、批评、翻译、改编和加工[1]。在他看来，翻译一定会引起对原作的一种改写，这突破了传统的“忠实”作为翻译标准的概念。所谓“忠实”是相对的、动态的，而不是绝对静止的，而“不忠实”实际上是目标语言主流意识形态对源文本的必要改写。因此，改写是对原文的操纵，这一社会现象是由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在因素所导致的。当与目标语言的主流社会和诗学观念相适应时，改写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改写这种方式与译者自身的创作动机和翻译目标有很大关系，它反映出译者当时所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体现了赞助人的意愿与译者的双重文化认同。

勒菲弗尔认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赞助人通过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这些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不是文本和语言本身，以下是操纵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2.1. 意识形态

翻译不仅是词语从源语向目的语的过渡，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对外宣传实际上是本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同国家可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持有不同的态度。而外宣翻译的特殊任务之一是向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国家介绍中国的最新发展、传统文化、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显然，外宣翻译应该考虑到目标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和诗学，才能使活动更有效、更受欢迎。同时，外宣翻译是源文化主导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产物，反映了赞助人和权力的意志，因此为了使外宣翻译更具可接受性、普及性和有效性，译者要充分考虑社会主流和个人意识形态以及目标文化的诗学规范。

2.2. 诗学

诗学概念是指文学体系中的行为规范或文学观念。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并据此操纵文学。因此一切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时译者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约束。这种影响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翻译策略时就能体现出来。诗学不仅决定了应该翻译什么样的源文本，而且决定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为了取悦读者，使译文为目标文化所接受，译者倾向于改写原文，以符合他们所处时代的诗学倾向。因此，外宣翻译应充分考虑到目标文化的诗学倾向，坚持以读者接受为中心，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改写，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外宣翻译的重要作用。

2.3. 赞助人

外宣翻译并不是脱离实际中进行的，而是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及操纵。这一因素就是赞助人，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组织、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王室、出版商以及媒体。而外宣翻译的背后往往有着赞助人，他们对于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外宣翻译使外国读者更多地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在维护国家利益、反映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树立积极的形象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中国传统的宣传方式往往是夸张且语言表达华丽。如果译者只是逐字逐句翻译，将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总的来说，外宣翻译不仅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形象和利益。

3. 孔子学院文艺巡演主持词英译案例分析

该文艺巡演项目主题为“中国风·客家情”，由江西理工大学选送并入选于2019年初全球孔子学院巡演计划。其汉语主持词是由高校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所撰写，内容包括“日出东方”“流光溢彩”“盛世华章”三大篇章，每个篇章则包含三个节目。文艺巡演主持词包含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并且展现了汉语特点，汉语十分重视词语的偶式对应，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和排比式词汇。同时，在语言上则偏爱运用修辞华丽的、文雅的和词义委婉的词语，以表达自身的思想感情。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诗学。因此，文艺巡演主持词的外宣译者应该高度重视译文，为了弥补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引起的差异，满足目标文化中的各种需求，删减或增加一些表达和概念是有必要的。

由于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操纵理论的影响，因此决定在操纵理论的指导下对该主持词进行翻译，分别通过对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操纵下的改写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这种改写包括了增添、删减、解释、重构等方法。这是为了使目标受众所接受，达到外宣翻译的预期效果而对原文进行的必要调整。

3.1.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外宣翻译

赞助人并不是不可见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意识形态体现他们在翻译中的影响力。中国对外宣传的赞助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对外宣传机构。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外宣翻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外宣译者应从中国的文化和政策立场出发，以维护中国的积极形象，并反映出赞助人所要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外宣翻译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被一只称为意识形态的不可见的手操纵着整个活动。意识形态可能会使译者对源文本进行有意改写[4]。

例1：这里曾经走过古驿道，迎来天下商；这里曾是红色的故都，革命的摇篮。

译文：Situated in southern China, Ganzhou is widely known as the cradle of Hakka People and birthpla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在处理此类表述时，译者应在忠实和灵活的前提下进行改写。在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对国家形象的关注上，译者是在本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进行翻译的。因此，外宣译者需要提前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预判，在做出翻译选择和决定前充分考虑政治内涵。在这句话中，包含了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特有的词汇以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词汇，而因为目标读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其中很多词语会让目标读者难以理解，容易引发意识形态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宣译者无视目标读者期望的视界，没有进行适度地改写，强行向不同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读者介绍有关中国的地域文化，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抵制，这样就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5]。因此相应的词汇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省略、转换或替代。例如“红色”一词，它是在中国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包含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如果直译为“red”，这是西方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的“red”这个词有很强烈的贬义意味，代表着“火”、“血”，也代表着暴力、流血，还能联想到激进、暴力革命等含义。因此在译文中将“红色的故都”改译为了“the cradle of Hakka People”，这能够有助于其它外国观众正确了解赣州，并有效地介绍了客家文化，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例2：舞龙、舞狮起源于中国古代。两千余年来，龙狮运动历代相传，鼎盛不衰。

译文：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2 millenniums, dragon-lion dance is a form of traditional dance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culture for dragons and lions are believed to possess qualities that include great power, dignity, fertility, wisdom and auspiciousness.

外宣译者还要考虑到目标读者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以及意识形态，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对原文进行改写，准确地传递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以及传统文化，从而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如果对“舞龙、舞狮”进行直译，这将不利于外国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因此译者可以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增补、

重构。比如增添与“舞龙、舞狮”相关的文化信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内涵进行了介绍，使目标读者了解到理解原文内容所必需的背景知识，贴近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这样既能有效地将原文内容呈现出来，又能加深目标读者对“舞龙、舞狮”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达到了宣传效果。

3.2. 诗学操纵下的外宣翻译

诗学是操纵的理论的另一重要因素，它反映了译入语文化。查明建指出，语言层面的转换只是翻译的外在形式，其本质是译入文化对源文化的操纵和利用。这种诗学首先操纵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进而决定了译者对目标语言形式的选择和最终译文的准确性。因此，译者应不断提高诗学意识，以便在翻译中更好地进行交流[6]。

外宣翻译对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中国对外宣传的材料大多是笼统、抽象的套话、辞藻华丽、还引用了大量的经典，并且多采用对偶、重复、排比的修辞手法，以达到夸张的效果。与之相比，英语对外宣传的材料则风格简洁、用词较具体，并注重信息的传递[7]。因此，外宣译者应该依据英文的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改写，迎合目标诗学，使读者找到共同认知点，从而提高传播效果，让世界听到并了解我们的声音。

例 3: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译文: A towering tree shall be credited to its roots; a deep river, its origins.

四字短语是汉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其结构短小、简洁、富有表现力。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其对应的词组，尤其是相似的表达形式。将四字短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准确地提取出，并将其适当地转换成目标语，是外宣翻译中的一大难点。因此在操纵理论下，为了保持表达强度，达到交际目的，改写也是必要的。由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诗学观念不太相同，外宣译者如果严格按照原文的内容和结构进行翻译的话，译文就会显得过于累赘重复，背离西方人的诗学观念，不容易被西方观众所接受，因此，原文通过改写重构了句法结构，分别将两个不同的句子合并起来，并且译文的第二个分句则将其改写为独立主格结构，使句子结构简洁、更具逻辑性、连贯性和可读性，更好地贴近西方观众的诗学观[8]。总的来说，改写降低了汉语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往往会给目标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因此通过改写，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诗学观，可以有效地提高传播效果。

例 4: 竹，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不一般的含义。它亭亭玉立，不畏霜雪，有君子之风。

译文: Bamboo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it is even regarded as a behavior model of the gentleman. As bamboo has features such as uprightness, tenacity, and hollow heart, people endow bamboo with integrity, elegance, and plainness, though it is not physically strong.

外宣译者在翻译时要用英语的思维方式来规划翻译的布局。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诗学在语言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体现在行文结构与遣词习惯上。汉语讲究事物发展的客观顺序，英语强调主体，与汉语相比，英语的逻辑语序多为“归纳演绎”，译者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9]。句式重构是将原文句子打乱后再翻译，这些被打乱的句子需要进行重新进行排列，以符合目标语言的逻辑思维习惯。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往往需要进行改写，根据原文结构设计出一个最佳的英语对等结构。这段汉语如果按字面意思逐字翻译，对于目标读者来说句子结构不够清晰，因此译者应按照英语的语言习惯进行改写。首先，这段汉语的重点是“竹，有君子之风”，将“君子之风”提到句子前面来强调，而句子的其它部分“亭亭玉立、不畏风霜”作为补充信息对其进行解释。这样就可以让目标读者先了解到最主要的信息，从而迎合了目标诗学，提高了对外宣传效果。

例 5: 中国，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中国，是我的祖国，生我养我风雨中走过；中国，我爱的祖国，给我幸福给我快乐。

译文: After numerous ups and downs throughout its development, China, my beloved motherland, has embarked on a new path with infinite vitality and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

中文的宣传材料往往有较多概括、抽象的套话,且语言表达华丽。译者应考虑读者的诗学背景,根据英语的风格特点,适当选择目标修辞手段和模式进行改写。为目标读者营造一种熟悉的文化和认知氛围,这有利于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使目标读者更加了解中国[10]。鉴于此,在译文中删除了原文中一些空泛的表达,如“生我养我”、“给我幸福给我快乐”,只将其实质内容译出。此外,还将原文中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古老而又年轻”这类描写译为“embarked on a new path with infinite vitality and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通过这种改写,重构句子结构,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这样就可以更直接地将更重要的信息传递给目标读者,有利于目标读者接受,从而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4. 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外宣翻译对树立良好健康的形象、传播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外宣翻译领域,操纵理论是一种合适的指导理论,它对国际交际翻译具有有效的指导作用。由于文化和思想背景的不同,国际交流往往会遇到因其差异而造成的障碍,而操纵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策略,也就是改写,以处理这些障碍。这种改写不再局限于语言对等,它更多的是一种在更高层面上的文化对话和交流,这是不同意识形态与诗学碰撞的结果。所以,外宣译者除了对词句和文本进行改写外,还应注重文本之外的因素,加强文本的交际效果。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构建国家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 [1] Lefevere, A. (2004)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2] 许钧, 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3] Lefevere, A. (2004)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A Sourcebook*.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4]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5): 16-23.
- [5] 胡芳毅, 贾文波. 外宣翻译: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 上海翻译, 2010(1): 23-28.
- [6] 查明建. 文学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构建——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2): 86-102.
- [7] 傅似逸. 试论对外宣传材料英译“以语篇为中心”的原则[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11): 37-39.
- [8] 唐根金. 也谈如何翻译汉语的四字格词语——基于 MTI 课堂教学的观察所得[J]. 上海翻译, 2020(1): 71-75.
- [9] 袁晓宁. 外宣英译的策略及其理据[J]. 中国翻译, 2005, 26(1): 75-78.
- [10] 孙艺凤.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J]. 中国翻译, 2012, 33(1): 16-23.